

以「共生」為坐標的文明敘事新表達

張頤武

最近，八集紀錄片《北緯三十度》在央視紀錄頻道播出，引起了廣泛關注。這部片子所處理的，是一個極有誘惑力也極有難度的題目：人類早期的文明，為何會如此密集地誕生於北緯三十度這條神奇的地帶？文明又是如何發生、延續，如何在自然的試煉與人群的協作中一步步走向複雜的？

它的八個分集，從農業、文字、藝術、技術、交換、城邑、大國到自然，講的不是八個國家的故事，而是八條貫穿文明演化的變量。真正塑造文明的，與其說是王朝更迭的短促事件，不如說是地理、作物與日常生活的緩慢結構；水稻以深耕腳下的方式孕育定居傳統，小麥推動遠途交換的商貿脈絡，玉米拓展山野邊際的生存版圖；二里頭以禮制構建廣域王權，底比斯借神聖儀式聚攏民心，哈拉帕以規整城建走出世俗化的城邦之路。不同文明在同一道考題面前各呈其解，差異由此不再是彼此隔絕的「特色」，而是同一人類命題的多元答案。在我看來，這正是「交流互鑒」能夠成立的敘事前提，也是這部片子最見功力的地方。

全片實地探訪上百處古文明遺址，鏡頭在萬年的時空中從容穿行，山河大地、古城殘垣在恢弘的畫面裏氣象萬千，氣勢磅礴；而解說則精闢透徹，往往寥寥數語便道破演化的關鍵，凝練而有鋒芒，不故弄玄虛，也不廉價煽情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這部片子所自覺確立的「中國視角」。這部片子的

可貴之處，在於它把中華文明的歷史經驗提煉為一種分析工具，也是一條認識路徑。「人與自然共生，人與他人共生，人與技術共生，這個持續演進的過程，就是文明本身。」這段話，可以說是全片的文眼。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的「和」文化——不消滅差異，而是在差異中尋找共存；不是征服自然，而是在順應中加以利用；不是排斥外來，而是在交流中豐富自身——由此被轉化為理解世界文明的觀察坐標。這個坐標的獨特之處在於，它同時超越了兩種流行的文明敘事：一種是把世界文明史寫成通往現代西方的單行線，另一種是把差異視為宿命裂痕的「文明衝突」之說。《北緯三十度》探究的是各大文明各自演變、各自發展，又在商貿的引力與技術的革新下走向「和而不同」的融合。海貝既出現在殷墟，也出土於三星堆，見證了遠距離的物資流動；烏魯克依託神廟凝聚人群，二里頭以規整的網格鋪展治理智慧。用中國經驗解釋世界，再用世界文明反觀中國，這種雙向互釋，正是「中國視角」作為分析工具與認識路徑的成熟之處。也正因為此，中國視角的發言才格外有價值：它不是從外部打量文明，而是帶著綿延萬年的文明記憶走進世界文明的現場，對「延續」與「共生」有切身的理解，並以自身的實踐向世界證明，文明可以在差異中共存、在交流中生長。

如果說敘事框架的創新體現的是結構上的自覺，那麼這部片子對「人」的發掘，則體現了一種更深層

的人文情懷。文明史敘事常常面臨一個危險：把文明抽象為制度、器物與符號的博物館，而遺忘了創造文明的活生生的人。《北緯三十度》的鏡頭，始終落在先民身上——不是少數英雄天才，而是無數無名的勞動者與共同體成員。一粒開啟定居傳統的農業種子，是「數千年的試錯與接力」中被一代代篩選的稻株；一個重塑社會秩序的文字符號，從陶籌印記、龜甲卜辭到泥板楔形刻痕、瑪雅聖符，凝結的是跨越時空、聯結彼此的永恆追尋；一座凝聚協作智慧的城市，是人類為了追求秩序、協作與安穩生活而做出的共同選擇。至於藝術，從蘇美爾的滾筒印章到中國的玉雕，從古埃及的坐像到漢代的樂舞陶俑，都被理解為身份與權力的表徵、對死後世界的想像，既推動着社會變革，也承載着先民對生命意義的叩問。這裏暗含的文明觀值得我們深思：文明不是某一個民族、個別天才的孤立創造，而是人類一直在作答的共同命題。

探究人與自然關係的《自然的試煉》讓人印象深刻。北緯三十度既是文明的搖籃，也是潛藏着最嚴酷試煉的生存帶：馬耳他的孤絕、兩河的變遷、伊朗高原與中美洲山地的劇變，一次次將早期文明推向崩潰的邊緣；而文明恰恰在「災難滅頂與反覆重啟」中顯示出驚人的韌性。這一集把「自然」從背景板提升為敘事的主角。與「征服自然」的現代性迷思不同，這部片子反覆強調的是一種古老的生存智慧：人類並不試圖征服自然，而是觀察、順應、利用自然的力

量。生產力有限的良渚先民修築起宏大的水利工程馴水防洪；江南的先民在潮湧與山洪之間經歷漫長努力，將塗泥之地改造成萬頃良田。這不是田園牧歌式的抒情，而是對文明脆弱性的清醒認知——「生活在北緯三十度地帶的人們，並不是這個星球上的幸運兒」。文明史由此被重述為一部人與自然博弈共存的調適史：環境給出考題，人類以技術、制度與信仰作答。這種自然觀，既為「文明何以興衰」提供了超越英雄敘事的解釋，也為今天的人提供了一面歷史的鏡子。

從更宏觀的意義上說，《北緯三十度》的價值，在於一種表達的自覺。這部片子以中華文明的共生經驗為坐標，重述人類文明的源流，「回望來路，照見未來」，這本身就是中國文化自覺的一個新標誌。它無意取代任何一種敘事，而是提供另一種可

能——一種不訴諸對抗、不預設高下、在差異中尋找共存的文明敘事。在今天這個影像的時代，紀錄片早已不只是記錄，它同時是文明自我理解與相互理解的方式；《北緯三十度》讓沉睡的遺址重新開口，讓散落各洲的文明彼此呼應。當文明對話成為時代的重大課題，這樣的表達無疑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。農業的種子、文字的記憶、藝術的凝視、技術的階梯、交換的引力、城邑的生長、大國的選擇、自然的試煉，八個關鍵詞串起的這條橫貫萬年的文明紐帶，同時指向兩個方向：向內，回望中華文明賴以生長的歷史經驗；向外，走進世界文明的現場。文明的未來，或許正如這部片子所暗示的那樣，不在征服與對抗，而在彼此照見、共同作答。

《北緯三十度》給我們深刻的啟示。



▲紀錄片《北緯三十度》實地探訪上百處古文明遺址。 視頻截圖

為美好待命



如是我見

張君燕

生活教會我們最多的，是居安思危，「思則有備，有備無患」。所以遇到事情時，很多人習慣先設想失敗，預判挫折，提前做好承接壞結果的心理建設。時間久了，或許會忽略另外一種可能，那就是人也可以為一份尚未到来的美好而準備。

參加一次地方文獻的採風活動，我有機會走進古籍修復工作室，見到了一位古籍修復的老先生。工作台的案頭堆着不少殘破書卷，有的被水泡爛，有的被蟲蛀得只剩碎片。我心下嘆息，這些書應該絕無修復的可能了。

那天，老先生手邊放着一卷破損極重的殘本，他取來一套選配好的補紙，整齊放在一旁。

「這本書也能修復好？」我忍不住問。

「試試唄，試了才知道。」老先生的指尖輕輕拂過碎裂的紙邊，繼續說道，「當然，有不少書到最後也救不回來。」

我追問：「既然如此，提前選配好補紙，豈非白費功夫？」

「萬一救回來了呢？」老先生的語氣很平靜，看着我說，「每次修復之前，我都在潛意識裏告訴自己，這本書一定能修復好。所以我不能等用到時，才慌忙去找材料。」

我站在老先生面前，肅然起敬。他並非看不見殘破與局限，也不迴避失敗的可能性。只是他沒有把全部心思，用來等候遺憾。風險他了於心，但準備，留給轉機。

我想起曾在書上讀到的一個小故事。一位父親失業帶着兒子四處輾轉，日子拮据困頓。乘車出行時，八歲的兒子忽然問他，想不想看自己拋撒口袋裏的五彩紙屑。父親怕弄髒車廂出言制止，隨後才得知，這是孩子隨身帶的「應急紙屑」。無論走到哪裏都帶在身上，專門用來迎接突如其來的好消息。

大人習慣反覆演練如何承受厄運，孩子卻揣着五彩紙屑，隨時隨地等候突如其來的好運。為壞消息做準備，可以幫我們抵禦傷害。可倘若心中只剩下防備，那道自我保護的牆，也會擋住意外照進來的光。

為美好待命，不是盲目樂觀，也不等於無視世間坎坷，是看清世事起落之後，仍在心底留出一處空位。人生不會永遠順遂，但也不必等喜訊確鑿到來，才敢懷有歡喜。於庸常之中積極等候，本身，就是對生活莊重的回應。



君子玉言

小 杏

走在伶仃洋的島上，我常常恍惚。

海風吹過來，漁村小路安安靜靜，眼前的一草一木，都莫名地熟悉。那股溫潤的氣息，太像當年香港生活的日子了。那些年在香港離島走來走去的記憶，本來已經藏進心底深處。可一踏上這海岸，又一片勾起來，今昔苔痕，點點浮起——

路邊大株的紫荊花樹，花瓣落在石階上；三角梅順着石牆攀援生長，一叢一叢往外探，開得潑潑灑灑；朱槿熱烈嬌艷，合歡花依舊軟軟萌萌，可愛度毫無二致。春天裏的黃花風鈴木把山坡點亮，一片明黃。漁村晾在門口的漁網，掛在屋簷下的鹹魚，路邊趴着打盹的狗……眼前的光景，恍若當年。

東澳島岸邊那幾塊被海浪打磨得溫潤的大石頭，碩大渾圓，靜臥在灘頭，潮來復潮去。遠遠望去，那姿態、那氣勢，分明就是塔門的呂字疊石。海濤陣陣，節奏也是一樣的。

第一次去伶仃洋的離島，我選擇了桂山島，因為她離香港最近，可以望見大嶼山。我站在山頂，面朝香港的方向，望了很久……後面又陸續去了東澳島、萬山島……

無論是站在岸邊礁石上，還是置身山林間，滔滔大海，綠樹繁花，總讓人一時分不清自己是在此岸還是彼岸。

中午在碼頭邊的漁家吃飯。菜單的制式也覺得眼熟，唯一的分別是簡體字。老闆娘推薦了蠔子，用豆豉和辣椒爆炒，鑊氣十足，肉肥嫩鮮甜；通菜配蝦醬，蝦醬是漁家自己做的，鹹鮮裏帶一點發酵的醇厚，和通菜的清爽搭得正好；文蛤豆腐湯，鮮滑幼嫩……吃到嘴裏那一下，味蕾如撞見老友記，恍然大悟——這難道不是香港西貢漁村的味道嗎？

清朝那會兒，九龍海關稅廠設在香港，專管包括伶仃洋這片海域的商船、收稅、查私貨。後來時局變幻，一八九八年清政府和英國

伶仃洋上，一脈山海

簽訂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，把九龍半島及附近海域租給英方，為期九十九年。原來中方設在香港汲水門、九龍城、佛頭洲、長洲的四個稅廠，全都得遷出去。長洲稅廠的職能，被整體挪到了東澳島。一八九九年十月某一日的午夜，長洲稅廠關閉，第二天，東澳稅廠就在東澳灣正式啟用。新稅廠管的事情跟原來差不多，監管往來香港與廣東西部沿海的華籍民船，徵收鴉片稅釐、百貨關稅，還負責緝私。鼎盛時候，一年監管進出境船舶九百多艘，高峰年份驗放旅客兩千人次上下。這座孤懸海上的小稅廠，一口氣運轉了二十年，直到一九一九年才關閉。

東澳島上有兩處關於江洋俠盜張保仔的遺蹟。立於鉅城門口的鉅碑上書「……嘉慶元年（一七九六年），『五色幫』張保仔……曾佔據此地……」。另一方銘碑《東澳島清代摩崖石刻簡介》介紹：清代嘉慶年間「大海盜張保仔統領『五色幫』部眾四萬人，打着『反清滅洋』、『劫富濟貧』的旗號，稱雄於南海海上。他們踞大嶼山為巢穴，出入於珠江口而無敵，佔東澳島刻下『萬海平波』和『武當勝景』兩處摩崖石刻」。

香港的長洲、塔門、南丫島和春坎角亦都有關於張保仔的傳說。據民國著名學者許地山教授考查，現今香港島的西貢盤是當年張保仔營寨的舊名。在港島歌賦山山腰，有張保仔舊



▲西伶仃洋。

作者供圖

時據守海島、以青磚和鑿石鑲砌而成的塹壕遺蹟。

此外，澳門海事博物館陳列的一幅受降圖上，明確註明係張保仔。

後來清軍招安，張保仔從東澳島撤離，據說把十八箱財寶埋在石刻附近，島上至今還流傳着一首歌謠：「珠寶十八箱，箱箱十八行，誰能得到它，早喝粥來晚宰羊。」在香港最為人所知是長洲張保仔洞，相傳也是他藏寶的地方，引得無數好奇之人前往探洞。

當年行走在維港岸邊，常見一艘古色古香的中式帆船，大紅色的帆篷迎風揚起，一面寫有「張保仔」三個大字的杏黃色三角旗在海風中獵獵作響，瀰漫着一股濃濃的老香港味道，這艘帆船就命名為「張保仔(aqualuna)號」……

回程的海上，島嶼在船後慢慢變小，變成海面上淡淡的影子。

伶仃洋從古到今流淌不止，波瀾不驚。炮火把這些地方隔開，故事又把它們連起來。隔不斷的山海相依、花木同風、滋味同源、文脈相繫。這些花木，這些口味，這些故事，從來不分彼此。

千百年的牽絆早已融進這片南海的風浪裏，靜默無言，卻始終緊緊相連。那些年在香港離島留下的情意，與眼前山海悄然相融。原來山海本就一體，根脈本就相連，所有牽掛與眷戀，都有來處，也有歸處。

從《海天集》憶柳木下(下)



燈下集

李廣宇

葉靈鳳對柳木下也是真的好，除了給他發表詩作，有時還為他借書買書。譬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日記載：「柳木下來閒談。借去日本新村出的選集一冊，其中有關於《伊索寓言》中譯本的文章。」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載：「上午偕柳木下往訪君葆，因他擬向馮平山圖書館借日文書籍事。」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載：「木下要買一部詩人里爾克的傳記，給他在別發書店除了一本。」這一天，葉靈鳳到九龍城憑弔宋王臺遺蹟，

就帶着柳木下同行。柳木下也常常成為葉靈鳳的談伴。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記載：「柳木下來談，談及紀德之死，想到自望舒死後，中國文壇對法蘭西及歐洲現代詩文有精神廣博研究者，也後繼無人了。」同年七月十九日載：「晚，柳木下來報館見訪，閒談日本出版界，彼謂美國有一寫自然史之作家，名賽東，與法布爾齊名。我則從未知有此人，暇當一查。」

葉靈鳳素來喜歡描寫自然的小品，尤其偏愛《塞耳彭自然史》，一直惋惜

其「應譯未譯」。柳木下就曾試譯過幾則，以《塞耳彭博物志》為題，收在他以苗湘成筆名編選的《世界著名作家散文選》（香港上海書局一九六一年初版）一書。葉靈鳳曾專門寫下《字字珠璣的名家散文選》，熱情予以推薦。去世前一年的年關，又找出此書，讀至完卷。

這本書裏還有柳木下翻譯的其他名家散文多篇，選文的眼光和譯筆都相當了得。他還翻譯過《池塘裏的故事》、《三個願望》等少年兒童讀物，並對兒

童文學創作頗有心得。倘若能更用功刻苦一些，成就想必會更大，也不至於終其一生窮困潦倒。

葉靈鳳也曾試圖勸說柳木下有些改變，一九五二年七月四日日記載：「柳木下來報館，便中勸其勤於寫作，因他近來生活甚窘也。」但他我行我素，一味閒雲野鶴，四處借錢。葉靈鳳日記裏有多條借錢給他的記載，這裏只舉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一則為例：「柳木下來，借去五元。他靠賣文為活，但又不肯執筆，而好預支稿費，曾屢次勸他勤

力多寫一點，則可不必拮据如此，總是癖性不改，亦一有趣人也。」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，柳木下犯病之後又來找葉靈鳳救急，日記是這麼說的：「柳木下來自言前數日神經混亂，夜間流浪街頭，遭人毆打並搶去衣物，房東又拒絕他入屋（欠租太多），要他搬遷。現暫住賓館，情形甚狼狽，因給他二十元又襯衣內衣、手帕、襪等。他表示要搬家，希望朋友們給他籌錢，可是平時又絕不肯為自己生活工作，一味靠借。真是一個問題人物。」

柳木下一直活到一九九九年。這本《海天集》靜靜躺在圖書館的書庫裏，成為他留給香港的唯一記憶。